

活跃在阳泉北部的敌后武工队



1941年秋,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了残酷的“大扫荡”,实行了毁灭性的“三光政策”(杀光、烧光、抢光),制造了大量的“无人区”,妄图使我边区的军民困饿而死。他们发动了娘子关、巨城、阳泉、白泉及铁路沿线的日军、伪军2000余人,强迫敌占区、接敌区的民夫3000余人,将根据地的大部分民房及建筑物烧毁,不能烧毁的石窑洞,也强迫民夫烧毁了门窗、刨毁窑顶,使群众无法居住。敌人除将庄稼抢收糟蹋外,还抢走边区军民的粮食、衣物、炊具、农具等。敌人在两三个月的反复清剿、“扫荡”中杀害了不少群众,不少老百姓穴居野外,冻饿生病而死者比比皆是。因此,抗日根据地也相对缩小了。敌人为了切断根据地与游击区、接敌区的联系,又在交通要道周边挖了封锁沟,修了封锁墙,阻碍抗日活动的开展。

接着敌人又在敌占区和接敌区开展了“治安强化”运动。加紧清查户口,搜捕我地下工作人员,残害抗日干部、家属;对给抗日政府赠交公粮的村干部,轻者打骂、重者杀头,凡住过抗日干部的人家,都以“通匪”治罪。

日寇还带领伪军和伪自卫团及特务,用闪击的办法反复包围一两个村,或几个据点的敌人共同出动,一次合围五个村庄,一条街一条街地搜捕我村干部;或突然包围野外窑洞、矿井,以烟熏、火烧、水灌等毒辣手段杀害抗日干部。有一段时间,县区干部不能下村,村干部不敢接近抗日干部,抗日工作十分艰难。

1942年春天,平定(路北)县委决定在县公安局、县基干游击队、群众团体中抽调政治可靠、胆大能干的人组成武装工作队(以下简称武工队)。这支武工队活动了将近两年,至1943年底结束。1944年春,由于形势发展的需要,再次成立武工队。县委确定武工队的任务是:深入敌后,发动和依靠群众,打击小股敌特和汉奸,反抗敌人的“蚕食”和“封锁”,恢复和扩大抗日阵地,最大限度地把敌人孤立起来。

武工队两次成立,人数都在30人左右,下分3个小分队,每个分队八九个人,都有优良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。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,和群众同吃、同住,还帮助群众锄地、挑水、干家务活。由于武工队的作风好,能深入群众,生活朴素,几次遇险,都是在群众掩护下,安全脱险的。

反特锄奸和打击小股敌人

汉奸特务犹如敌人的耳目和爪牙,不打掉敌人的耳目和爪牙,要想在敌后活动是不可能的。因此,武工队集中力量处决了一些罪大恶极的汉奸特务。

处决叛徒史贤臣。史贤臣原是我方公安局一名工作人员,在1941年秋季反“扫荡”中投敌叛变,随后常常带领敌人抓捕抗日村干部和群众,瓦解我抗日基层组织,还大量掠夺群众财物。武工队在群众协助下迅速查清了史

贤臣的住址,选派了4名精干队员,在一天清晨破其家门而入,用菜刀将他处决。

白泉据点有个大汉奸郭健为非作歹。1943年秋季的一天,武工队的3名队员,化装潜入白泉据点,当夜10点钟左右翻墙跳入其姘头家里将他打死,为白泉及附近村庄除了一个大害。这对日军、伪军、汉奸们震动很大,他们感到八路军、游击队像“神军”一样能飞檐走壁,郭健住在据点里,在敌人堡垒底下,也被游击队干掉。杀了郭健,周围群众无不称快,抗日工作开展得更顺利了。

1942年夏天的一个中午,武工队收到确切情报,得知阳泉有一部分伪军要前往河底和盂县据点。武工队员张玉玺、史翠然、梁书壁等十多人配合千亩坪民兵,利用杨树沟村外一个有利地形,伏击敌人,打死伪军3人、俘虏1人,并缴获步枪4支。同年秋,武工队正在汉河沟一带活动,魏家峪来说村中有4个日军密探,正在村公所里大吃大喝,勒索钱财。于是队员们化装成求雨的人,戴着草帽、端着香纸、鞭炮,7个队员分两路向魏家峪村的庙宇走去(村公所设在庙里)。到庙门口,留2人在门外监视,5人齐向敌人冲去,当场打死3个、跑了1个,随后队员们追到黑沙堰将逃跑的敌人打死。从此,敌军的密探、汉奸再也不敢过去那样大摇大摆地到村里欺男霸女、讹诈钱财了,抗日工作也比过去好做多了。

领导民兵反对敌人封锁

武工队成立之前,敌人已经在我一区 and 四区之间的交通要道周边挖了封锁沟,山上垒了封锁墙,使我三区、六区、一区的根据地,与一区南部、七区西部和四区、五区全部的交通联系受到极大的阻碍,增加了开展和巩固游击区工作的困难。为此,武工队发动民兵开展了毁墙填沟的斗争。

第一次是县委指示县武委会,发动一区、四区、七区的民兵统一行动,由武工队配合掩护,把这三个区的封锁沟墙,来一次彻底的清理。接着,敌人又强迫各村重新修建,敌人白天修,我们夜间破,经过反复斗争,封锁墙再没修起来,这样抗日干部就能比较自由地在四、五、七区活动了。

阳泉至盂县城的道路、电话线,是日寇交通运输、通讯联络的大动脉。武工队成立后配合武委会发动民兵,开展了破交割线的斗争。武工队组织沿途村庄的民兵,按村界或指定的地段来完成,武工队负责组织动员和警戒。1942年冬天,张浩昌带领武工队队员组织千亩坪、杨树沟的民兵在苇泊梁、寡妇桥一带割过两次电线;组织南庄、后沟子的民兵,割断清城至乌玉村一带的电线;破坏了青崖头至清城的两座公路桥,使敌人不能通车。1943年夏,张浩昌带领队员,配合四区干部,在柳沟、小西庄、桃坡、李家庄一线,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割线斗争。这次斗争共取回日军在电线杆上挂的手榴弹40多个、地雷12颗,收回电线

1500多公斤。

发动群众建党建政,恢复游击区工作

在抗战最艰苦时期,由于敌人残酷“扫荡”破坏,大部分抗日组织陷于停顿和瘫痪状态。个别抗日村干部逃到外地谋生,留在村里的也不敢接近抗日政府。因此,要开展抗日工作必须团结群众,利用各种关系,壮大抗日力量,恢复游击区工作。武工队派王起带领队员深入到千亩坪、烟里、三泉、桃坡一带,了解各村基层组织在敌人摧毁下的损失情况,还把外逃的干部叫回来,缺额干部补选起来,大力宣传抗战形势和持久战理论,宣传中国必胜、日本必败,大大提高了群众的抗日信心。

武工队副队长杨依泰带五六名队员到曹家掌、燕窠、吴家掌、马家坡一带,多次召开村干部会,健全了各村的基础组织。群众看到武工队的活动,从心里感到高兴。庙堰村的周淘气老汉,年已五旬,但对抗日工作非常热情积极。他主动和白羊墅据点的伪村长联系好,把武工队引进据点建立关系。从此,武工队护送来往过路的干部均比较顺利,还多次送出了重要情报。

武工队指导员刘晋民等人通过队员赵延华的母亲史改妮、弟弟赵义和,在下荫营建立了我地下活动站。敌人的便衣、特务常来下荫营骚扰,强迫赵母限期将赵延华叫回来,并多次对赵母进行拷打,但赵母从末屈服,一直坚持斗争。武工队后来还在下荫营发展了刘金仓等五人入党,有了党的组织,该村工作更为活跃。在经过充分的工作后,荫营据点情况和上下荫营的社会情况我们都能掌握,荫营敌据点竟成了我们的保险地,两三个连拉进去休整几天都没问题。刘金仓同志又发展了汉河沟的姜和小等三人入党,并组成秘密的游击小组,直接归武工队领导。他们的工作重点是蒙村三矿一带,给我们做了不少工作,三次配合我们拉出敌人骡子三十余头。

为解决失业矿工的生活困难问题和展开对敌斗争,武工队发动工人利用夜间到日军矿上破坏、拆毁敌人运煤的铁轨,割断电线,并将仓库的炸药、雷管等偷运回我根据地,换成钱和粮食,既解决了武工队和当地群众的生活困难问题,又打乱了敌人掠夺我煤铁资源的计划。

从1942年~1945年的4年中,武工队仅在一区就发展了50多名中共党员,建立了7个基层支部,培养选拔了各级政权、群众团体和民兵组织骨干200余人。在大部分村庄重建和发展了抗日组织,把10个村的伪政权改造成了两面政权,使游击区的抗日斗争形势有了很大好转。

配合部队作战,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

伏击虎神庙伪军。1945年7月的一天,武工队根据荫营内线关系王三孩(现名王庆华)的密报,决定在虎神庙附近打埋伏。队长王联保、政委李黎明带领20多个英勇的战士,于深夜12点从辛庄村出发,到达目的地埋伏好,一直等到

次日上午8点,伪军一个班全部进入伏击圈时,王队长一声令下,战士们打的打、冲的冲,个个像老虎一样扑向敌人。消灭伪军1个班,毙敌5人、活捉6人,缴获三八式步枪10支、冲锋枪1支,子弹1000余发,武工队无一伤亡。

巧攻荫营据点。1944年3月,荫营据点日军调走,只留伪军驻守。我们决定拿下这个据点,平定大队长李鸣岐带着一个连的兵力,由武工队配合,侦察员乔步喜同志引路,战士、干部都穿上日本宪兵队的黑衣服打着“膏药旗”,在早饭时间大摇大摆地走到敌人据点前。伪军士兵们正在用饭,以为我们是阳泉来的日本宪兵队。在敌人猝不及防下,不到一个钟头,我们就把伪军一个中队100多人全部俘虏,缴获大量武器和弹药,晚上又去烧毁了敌人的碉堡。我们打的这个漂亮仗,还受到军分区的表扬。

配合主力部队、县大队消灭阎锡山的部队。日本投降后,阎锡山按照蒋介石的命令,把驻阳泉地区的日伪军、宪兵、特务都收编为他们的所谓“新自卫军第四师”。这批汉奸在抗战期间出卖祖国、欺压人民,血债累累,一夜之间突然变成抗战有功的新贵,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,群众对他们恨之入骨。为了打击“二鬼子”的嚣张气焰,保护人民利益,武工队配合八路军四分区八团及县大队,于1945年11月对其发起攻击,将驻平坦恼东沟的新编四个团建制的伪军全部打垮,消灭伪军200多人,缴枪100余支,摧毁敌人碉堡10多个。

在这次战斗中,路北军民,尤其是上、下荫营的人民群众,热情为军队腾房、烙饼、抬担架、带路,积极配合部队作战,发挥了重大作用。有些年轻人主动报名参战,为军队运送粮食、蔬菜,押送俘虏,保证了战斗的顺利进行。随后,我军在荫营召开了万人祝捷大会,当场就有二十多名青年报名参军,附近各村也掀起了慰劳八路军的热潮。

反对敌人抢粮、抓丁和掠夺财物

日寇为了达到其以战养战、长期侵略的目的,在敌占区、接敌区的所谓“爱护村”大量掠夺粮食并抓壮丁。1942年以来,敌人的抢粮、抓丁行动更为疯狂。我们对敌斗争的办法是:动员村里用拖延应付的办法,少给或不给敌人送粮、送丁;集中起来给敌人送粮、送丁,事先和区里联系好,在半路上由武工队配合民兵把粮食和壮丁扣回来,再由村里向敌人报告走到某某地方被八路军截走了。1943年春天,苇泊、三郊、杨树沟、千亩坪等村给阳泉的敌人送粮、送丁,四区干部配合武工队员,在半路上扣留,粮食交抗日区政府顶了救国公粮,壮丁们有的送后方教育几天,放回村里做抗日工作,有的到自己的亲戚家里躲藏一段时期,再回村里。

为了打乱敌人征粮、抓壮丁的计划部署,县武委会的赵叶民和程瑞先后带着民兵两次砸了荫营伪区公所,缴获一些粮食、布匹及敌伪文件。

有些村怕敌人来烧杀,偷偷地

给敌人送粮食、送壮丁。区里知道后,就派武工队员和民兵在半路上截获。如三泉村有一次给敌人送粮食被武工队员在甄家庄截住,将粮食交区公所顶了公粮,又将该村支援敌人的两个村干部送往县政府扣了两个月才放回来。从此,大部分村庄不敢公开给敌人送粮食了。

1942年秋季反“扫荡”后,敌人将抢来的100多头牛、驴圈在蒙村的后山沟里。为了夺回这批人民的财富,武工队员和县大队的侦察员乔步喜及根据地的一部分民兵,由刘备山悄悄潜入蒙村机智勇敢地将被批牲口赶回来,全部交还群众。

1943年夏,武工队的张祥和、县大队的侦察员乔步喜等,夜间深入铁路线上的石卜咀村,爬墙跳入敌人关牲口的大院内,将80多头敌人用来运煤的骡子全部赶出来,正遇上敌人的火车经过,汽笛轰鸣,骡子受惊,丢了一部分。到荫营虎神庙时,又遭遇敌人,边打边走又丢了一部分,其余骡子都赶回根据地,低价卖给老百姓使用。

1945年,白泉据点的敌人把三泉村村民冯保孝的100多只羊抢走了,冯保孝又急又气又无奈。冯保孝哭着向我们求援,为了维护群众利益,我们在了解情况后,派出两个武工队员化装成老百姓,连夜潜入白泉敌据点,在群众掩护下,把这100多只羊全部赶回交还原主。这件事,不仅让冯保孝深受感动,还让接敌区的群众认为武工队、抗日政府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的。

在催收合理负担和救国公粮方面,武工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。在铁路沿线,敌人频繁往来,监管极严,但在武工队能活动的地方,都能给政府送粮、送款。如桃坡两面村长王恭,用10匹骡驮200匹洋布,在武工队员掩护下往根据地送,待武工队和骡子走了10多公里的时候,让村里人把他绑在村子里,再去报告敌人说:“八路军来围了村子,把村长绑起来,把洋布夺走了。”

我们这支武工队虽然只有30人左右,武器少而劣,但在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、拥护下,在艰苦残酷的环境中却能打开局面、站稳脚跟,贯彻党的政策,组织发动广大群众,帮助恢复和扩大了抗日阵地,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。

武工队像一把利剑,直插日寇的心脏,把他们搞得心惊胆战。敌人把武工队看成是眼中钉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日伪军曾多次搜寻和包围我们,但其阴谋始终未能得逞。

武工队是一支以群众利益为上的革命队伍,因而群众把武工队看成是自己的保护者、贴心人,武工队所取得的成绩和群众的支持分不开。“兵民是胜利之本”,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。武工队还是个革命的熔炉,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,培养锻炼了一批骨干力量。最后向与武工队一起活动而光荣牺牲的梁增禄、赵福锁、郑鏊、潘天如、赵义和、姜和小等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纪念!

(张浩昌 李黎明 郭一平 史守恭)